

拉美国家社会形势的近期演变

苏 振 兴

主要观点 80 年代以来, 拉美地区失业率总体呈上升趋势, 目前地区平均失业率超过 8%, 就业质量明显下降, 表现为就业机会主要来自于非正规经济部门和传统服务业。因此, 收入分配进一步向高收入阶层集中, 社会贫困化程度加剧。拉美社会贫困问题由以往主要是一种农村现象转化为主要是一种城市现象。

拉美社会形势恶化有多方面的原因: 80 年代严重的经济衰退及经济调整引起的高通货膨胀; 90 年代中期起国际金融动荡引起的经济滑坡; 某些经济改革措施产生的负面效应, 等等。

近 20 年来, 拉美国家在如何处理社会问题方面存在着两种学派: 新自由主义学派和新结构主义学派。

拉美国家的社会贫富分化问题并不是一个新近才出现的问题。

关键词 拉美 社会形势 演变

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07)

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严重失调, 是拉美国家长期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在国际上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 拉美不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 但的确是财富分配最不公正的地区。最近 20 年来, 拉美经历了许多重大变动, 如 80 年代的债务危机和经济衰退, 空前规模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模式的转换, 90 年代前半期的经济复苏及随后的国际金融动荡的冲击, 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下, 拉美国家的社会形势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一 社会形势不容乐观

最近, 有关学者根据对 17 个拉美国家的一项调查, 就当前拉美地区的社会形势作这样的描述: “当前, 社会上存在一种悲观气氛。半数的居民认为, 国家的形势是糟糕的。60% 的居民认为, 近几年中没有取得任何进展。2/3 的居民表示, 现在的财富分配是不公正的。50% 的人表示, 靠现有的家庭收入不能满足其基本需要。3/4 的被调查者认为, 在 1990~ 1995 年期间贫困程度增加了。” 下面, 笔者从几个主要方面作些介绍。

就业状况的变化 在现代社会中, 劳动就业是广大劳动者获取收入的主要来源。不能获

胡安·路易斯·龙多尼奥、米格尔·斯泽克利: 《10 年改革后分配上的意外: 90 年代的拉丁美洲》, 载《伊比利亚美洲思想》1998 年特刊, 第 195 页; 关于拉美 17 国公众舆论调查《拉丁晴雨表》始于 1995 年, 引文中的结论来自 1996 年的调查报告。

得就业机会的劳动力越多，失去主要生活依靠的居民数量就越多。因此，劳动就业状况如何就成为反映社会形势的一个重要标志。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拉美和加勒比地区1980年城市公开失业率为6.6%，1985年上升到10%，1985年后失业率呈下降趋势，1990年降为7.9%，1993年恢复到1980年6.6%的水平。但是，从1994年起，拉美地区失业率再度攀升，目前已超过8%。

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提供的拉美地区90年代城市失业率的统计，虽然在范围（含22个国家）与口径上与国际劳工组织略有不同，但同样表明，1993年以后拉美地区失业率不断上升。统计数字最完整的是1997年。这一年是90年代拉美经济增长的第2个高峰年（增长率5.2%），地区平均失业率也相对较低（7.3%），即便如此，22个国家中失业率超过两位数的有10个国家。

就业状况既反映在数量方面，也体现在就业质量的高低上。进入80年代以来，拉美地区就业结构的所谓“第三产业化”和“非正规化”特点进一步强化，即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进入第三产业部门和非正规经济部门，因而就业不足现象更加严重，就业质量进一步下降。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界定，“非正规经济部门”包括家庭服务、非专业劳动者各种自谋生计的形式及5个劳动力以下的微型企业。1980年，拉美地区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劳动力占就业劳动力总数的40%，1990年增至52%，1996年达到57%。1990~1994年期间，假如拉美每新增100个就业岗位，非正规部门就占81个，1996年达到85个（在这85个岗位中，微型企业的就业岗位占44个）。这充分反映出近20年间拉美大中型企业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严重下降。“虽然不能说微型企业中的就业岗位都是低质量的，但是，这些企业中的劳动条件通常都是不稳定的。在微型企业中工作的65%~95%的人没有劳动合同；65%~80%的人没有参加医疗和养老保险；劳动日往往比法定的要多；劳动事故和风险更大；有关童工、强制劳动和劳工谈判、参加工会自由等劳工权利往往不受尊重。”另据报道，拉美地区非正规经济部门工人的平均报酬一般只相当于正规经济部门的50%。

非正规部门与第三产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第三产业是整个服务业的总称，既包括要求劳动者素质很高、劳动报酬也很高的现代服务（如金融、电讯等）行业，也包括传统服务行业。拉美就业结构的“第三产业化”主要指的是传统服务业就业人数的增加，意味着这个行业中就业不足现象的加剧。以阿根廷为例，1980年工业部门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26.3%，1994年降为21%；同期，商业部门就业人数由占16.5%增至23.4%，服务业部门（不含金融业）就业人数由占16.8%增至21%。其他拉美国家就业结构的变动趋势与阿根廷相似。

收入分配的变化 国际上通常按基尼系数的高低将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程度划分为4类：轻微——基尼系数在0.25以下；一般——基尼系数为0.251~0.35；严重——基尼系数为0.351~0.45；很严重——基尼系数超过0.45。

根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提供的80年代和90年代拉美13个国家城市家庭收入分配状况的统计资料，这13个国家收入分配状况的基尼系数的算术平均数为0.433。按上述国际通用标准划分，拉美国家属于社会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一类。事实上，用算术平均数来衡量还低

国际劳工组织：《拉美、加勒比地区就业形势报告，1993年》，智利圣地亚哥，1993。
拉美、加勒比经济与社会规划研究所：《关于发展和国家职责的思考》，第37页，智利圣地亚哥，1998。
同，第38页。
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拉丁美洲社会概况，1997年》，第53页。

估了拉美国家收入分配不公的严重程度，用加权平均数来衡量可能更接近于实际，因为巴西的人口占全地区总人口的1/3，而巴西的基尼系数是最高的。

从统计数字具有可比性的国家可以看出，80年代的突出特点是收入分配集中程度提高。例如，1990年同1980年相比，有关国家基尼系数提高的幅度分别为：墨西哥32%，委内瑞拉24%，巴拿马15%，阿根廷13%，巴西9%。乌拉圭是惟一个基尼系数下降的国家，降幅7%。这一变动反映在不同组别家庭的收入比重上就表现为：40%最低收入家庭在总收入中占的比重减少，20%最高收入家庭占的比重增加，40%中等收入家庭占的比重则或有减少，或略有增加。90年代前半期的变动趋势有所变化，即阿根廷、哥斯达黎加、委内瑞拉等国继续保持80年代收入分配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趋势；巴西、墨西哥、巴拿马等国基尼系数缓慢下降，但并未扭转80年代的收入分配集中的趋势。可以说，1980年以来的15年间，除乌拉圭外，其余12个国家的收入分配形势都恶化了。

贫困化程度的变化 衡量拉美地区贫困的标准是：家庭收入不能满足其家庭基本需要者为贫困，家庭收入不能满足其家庭最低食品需求者为赤贫。根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对19个拉美国家的综合统计，1980年，贫困人口总数为1.359亿，其中赤贫人口6240万；1994年，贫困人口总数达到2.093亿，其中赤贫人口为9830万，分别增加7340万和3590万。也就是说，这19个国家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在1980~1994年的15年间增加了54%，其中赤贫人口增幅达57.5%。

这一统计资料还表明，其一，80年代拉美地区贫困人口增加速度比90年代前半期要高得多，即1990年比1980年增加6140万，而1994年比1990年增加1200万。可见，从1991年起贫困人口增加的速度呈减缓之势。这与拉美国家经济从1991年起普遍恢复增长及各国政府增加社会开支和扶贫工作力度直接相关。其二，1980~1994年间，贫困人口的增加几乎全部集中于城市地区，因为同期农村地区贫困人口仅增加90万人，而城市贫困人口增加了1.15倍。拉美地区的社会贫困问题由以往主要是一种农村现象转化为主要是一种城市现象，是一个很值得引起警惕的变化。城市地区居民高度集中，信息传播速度快，各类社会团体对某些事态作出反应的能力更强。社会贫困化现象在城市地区的加剧将大大增加社会稳定的脆弱性。

关于拉美国家间贫困化程度的差异，可按每个国家贫困家庭占家庭总数比重的高低大体分为4类：第1类国家的贫困家庭占家庭总数的20%以下（其中乌拉圭占6%、阿根廷占12%）；第2类国家的贫困家庭占家庭总数的20%~39%（其中智利占20%、哥斯达黎加占21%、巴拿马占30%、墨西哥占36%）；第3类国家的贫困家庭占家庭总数的40%~59%（其中巴西占41%、委内瑞拉占42%、哥伦比亚占47%、秘鲁占52%）；第4类国家的贫困家庭占家庭总数的60%以上（其中危地马拉占63%、洪都拉斯占73%）。

在1980~1994年间，拉美国家贫困化程度的变动趋势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贫困家庭占家庭总数的比重有所下降（如哥斯达黎加下降1%，乌拉圭下降3%，巴拿马下降6%，智利下降19%），另一类是贫困家庭占家庭总数的比重有所上升（如墨西哥上升4%，阿根廷上升9%，巴西上升9%，委内瑞拉上升20%）。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缺乏1995年以来有关拉美国家收入分配和贫困化情况的完整资料，人们尚无法对各国的情况进行严格的比较。不过，自1995年受墨西哥金融危机冲击之后，特别是1997年以后由于受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及厄尔尼诺现象、飓风等造成的大面积自然灾害，拉美国家经济总体上处于严重滑坡局面。因此，基本上可以肯定，当前拉美国家的社会形势不会好于1994年。

二 基本原因分析

对拉美地区来说, 80年代和90年代是危机与改革的年代。80年代初爆发的债务危机引起拉美地区持续的经济衰退, 1981~1990年, 拉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仅为1%,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90年代前半期, 拉美经济出现恢复增长的局面。1994年年底墨西哥爆发的金融危机并产生波及拉美地区的“特吉拉效应”, 导致1995年全地区经济严重滑坡。从1997年第4季度起, 拉美地区又连续受到国际金融动荡的强烈冲击; 1999年年初, 巴西爆发货币危机并给周边国家造成负面影响。1991~1998年, 拉美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5%和1.7%, 远远低于1950~1980年年均分别为5.6%和2.8%的增长率。贯穿于80年代和90年代的拉美经济改革无疑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这场经济改革, 特别是改革的前期阶段具有明显的被动性。其一, 改革是在经济危机已经爆发、经济处于全面衰退的情况下起步的, 时机非常不利。其二, 拉美国家普遍背着沉重的外债负担, 财政极端困难, 在国际上缺乏资信, 因而在国内经济政策上没有多少选择余地。其三, 拉美国家自身对这场经济改革事先没有进行必要的理论与对策准备, 改革初期几乎全盘接受了西方债权国和国际多边金融机构提出的理论思想和政策主张, 很少考虑这些理论与政策是否符合本国实际以及国内的承受力。这些情况无疑增加了改革的代价。广大中、下社会阶层不得不同时承受危机和改革的双重代价。

从劳动就业的角度看, 拉美80年代的经济衰退和90年代的低速增长大大降低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与此同时, 拉美劳动力的供给却处于历史的高峰期。据统计, 80年代和90年代, 拉美地区经济自立人口年均增长率为2.6%; 劳动力绝对数量的年均增长50年代为130万, 60年代190万, 70年代310万, 80年代330万, 90年代410万。除劳动力的自然增长外, 在经济危机的环境下, 大批妇女打破传统习俗, 走出家庭寻找工作; 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被迫放弃学业, 过早地进入劳动市场。据统计, 在拉美国家, 最近15年参加工作的妇女占妇女劳动力总数的比重最低的达37%, 最高的超过50%。另据14个拉美国家的统计, 1980~1994年, 女青年参加工作的比重, 墨西哥由25%增至33%, 巴拉圭由41%增至54%, 乌拉圭由43%增至53%, 巴西由43%增至51%, 玻利维亚由35%增至40%, 哥斯达黎加和厄瓜多尔均由33%增至38%, 委内瑞拉由26%增至31%; 男青年参加工作的比重, 巴拉圭由66%增至81%, 墨西哥由55%增至63%, 巴拿马由56%增至64%, 厄瓜多尔由56%增至59%, 委内瑞拉由58%增至61%。此外, 拉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浪潮仍在继续。1980~1990年, 拉美农业经济自立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仅为0.5%, 大大低于全地区的平均增长率。而且, 留在农村的劳动力主要是40~64岁这个年龄段的人。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城市, 进一步增加了城市地区的就业压力。

拉美国家的改革过程对于就业也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例如, 大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国家机构的精简, 使许多职工失去原来的工作岗位; 开放国内市场的步子过于急促, 使很多中小企业因无力适应激烈的外部竞争而倒闭; 在改革的微观层面上, “企业的调整主要是把降

美洲开发银行:《拉丁美洲的经济与社会进步, 1987年》, 第92页, 华盛顿, 1987。
同, 第36页。

低就业水平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边际利润的机制，在工业部门尤其如此。”以“劳工市场灵活化”为主导的劳工改革（如取消集体劳工谈判，降低雇主解雇工人时支付的费用，减少长期劳工合同，提倡使用临时工等），迄今并未达到增加就业的预期效果，相反却增加了劳工就业和收入的不稳定性。

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80年代和90年代，拉美公开失业和就业不足现象的不断出现，是造成工薪阶层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此外，在80年代危机期间，各国政府普遍采取冻结工资、压缩公共开支特别是压缩其中的社会开支等紧缩性财政政策。与此同时，整个80年代，拉美地区年均通货膨胀率基本上一直保持在3位数的高水平上。补偿通胀损失的通常办法是，按前3个月通胀的平均率调整工薪报酬。上述政策措施使工薪阶层的收入和福利水平进一步降低。

最近20多年来，拉美国家经历了一个社会财富向上层资产阶级转移的过程。先是在70年代后半期拉美国家向外借贷的高潮中，国内一些实力雄厚的私人集团既直接从国际资本市场借债，又利用国内金融市场的混乱进行金融投机，因而积累了大笔金融资产。在债务危机爆发后，一方面，这些私人金融资产早已转移到国外。据80年代末的不完全统计，拉美资本外逃量最大的4个国家是：墨西哥838亿美元，委内瑞拉581亿美元，阿根廷459亿美元，巴西312亿美元，分别相当于本国当时外债总额的78%、166%、77%和26%。另一方面，在债务危机期间，国家又不得不将一些负债累累的私人银行暂时收归国有，或为一些私人企业的债务提供担保，后来干脆通过所谓“债务国家化”将私人债务转为国家债务。当国家缺少外汇时，政府又以高于市场牌价的价格从私人出口集团手中收购外汇来还债。当90年代国内经济形势好转、私有化也进入高潮时，那些80年代外逃的私人资本又纷纷回流，或利用优惠政策进行投资，或与跨国公司一道收购国有企业。一项统计资料表明，1976~1990年间，5个拉美国家私人金融资产的增长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按各种形式的私人金融资产总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计算，阿根廷由1976年的12.5%增至1990年的42%，同期哥斯达黎加由17.3%增至50.7%，智利由16.4%增至68.3%，墨西哥由30.3%增至46.9%，委内瑞拉由30.5%增至63.3%。¹⁰ 社会财富集中化过程的一个直接后果是，雇佣劳动者的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的比重大幅下降。根据17个拉美国家的统计，战后至70年代初，雇佣劳动者的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呈上升趋势，而从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则普遍呈下降趋势。其中，阿根廷由1970年的40.9%降为1989年的24.9%，智利由1970年的42.7%降为1985年的33%，乌拉圭由1970年的45.8%降为1988年的33.4%，墨西哥由1970年的35.7%降为1988年的25.9%。¹¹ 拉美国家长期存在农村生产资料占有高度集中的问题，近20多年来又出现城市中资产占有加速集中的趋势，社会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就不足为奇了。

三 指导思想与社会政策

最近10年间，拉美国家的政界和学术界围绕社会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从这场讨论中可

同，第34页。

《美洲经济》杂志发表的《如何引诱逃离资本》的报告，载该刊1989年9月第31期。

¹⁰ 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根据有关国家中央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资料作出的统计。

¹¹ 参见P. 萨因斯和A. 卡尔拉尼奥：《寻求另一种发展模式》，载《拉美经委会评论》第48期。

以看出,关于社会问题的指导思想和社会政策方面大致存在两种不同的主张。自80年代以来在拉美地区处于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关于社会问题的基本指导思想是,社会贫困问题将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而逐步趋于缓解,即把社会贫困的消除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因此,这一学派有以下观点。第一,应尽最大可能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如果拉美地区经济年增长率达到6%,就业及整个社会问题就会大大缓解。第二,应增加社会开支,90年代前半期一些社会问题之所以有所缓解,就是在经济恢复增长的情况下有关国家较大幅度地增加社会开支的结果。第三,近20年来进行的各项改革不仅没有对社会问题造成负面影响,恰恰有利于加快经济增长和提高经济效益。现在的问题是改革还不够深入,特别是劳工市场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严重滞后。第四,国家应最大限度地退出社会服务领域,让私人部门在这个领域充分发挥作用。1998年由美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里卡多·豪斯曼主持完成的一项研究,也基本赞同经济改革没有对社会问题造成负面影响的观点,提高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是解决拉美国家社会不公问题的最有效办法。¹²

以拉美经委会为代表的拉美新结构主义学派于1990年发表《生产改造与社会公正相结合》一书,提出了经济增长应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主张。这一学派的学者近期还进一步提出了以下观点。第一,近20年来拉美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除了自身经济危机的影响外,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是一个重要因素,表现为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收入差别扩大,创造就业的活力下降这样一种普遍性现象。其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加剧了要素流动的不平衡,资本和熟练劳动力可以比较容易地跨越国界流动,非熟练劳动力则不能,生产活动在地域内重新分布,使得所有国家中的劳工需求变得更具有弹性,从而降低了劳工的谈判能力,增加其就业与收入的不稳定性;以国际贸易和国际融资为特点的规模经济表现为大公司在各经济部门更大程度的参与,而这些大公司都是资本密集型和使用熟练劳动力的;由贸易引起的更多的技术转让,使处于国际化过程的发展中国家采用需要高素质劳动力的技术。¹³第二,经济更大程度的开放应伴之以国家对居民更高的社会保护。通过对世界115个国家的研究证明,经济开放的程度与国家对居民的保护程度是成正比的。拉美国家恰恰在这个过程中降低了对居民的保护。¹⁴第三,在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对危机和衰退作出的反应,以及经济调整对贫困者造成的代价,加深了经济和社会问题,而不是使这些问题得到解决。新自由主义模式削弱了拉美国家解决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能力。因此,重新认识新自由主义改革是拉美的当务之急。¹⁵第四,拉美国家的劳工市场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其中包括智利的养老金制度改革),其效果并不像某些宣传所说的那样好。至于把基本的社会服务都交给私人部门去经营,那更是一种不可取的主张。私人部门经营都以赢利为首要目的。以医疗服务为例,私人医疗机构一般只愿设在大中城市,而不愿意在人口分散的地区提供服务,其收费标准通常比公共医疗机构高得多。再以住房为例,私人房地产商最乐意为高收入阶层建造住宅,而对供中低收入阶层使用的住宅建设不感兴趣。

鉴于在社会问题上缺乏比较一致的指导思想和政策主张,拉美各国,甚至同一个国家的前后几届政府,在社会领域采取的政策措施存在很大差别。如在社会开支方面,根据拉美经

¹² 同引文。

¹³ 艾伯特·贝里:《对付拉丁美洲收入分配威胁》,载贝里本人编辑出版的《拉丁美洲的贫困,经济改革和收入分配》一书,林恩瑞拉尔出版社,博尔德,科罗拉多州,1998。

¹⁴ D. 罗德里克:《全球化已经走得太远了吗?》,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1997。

¹⁵ 埃菲社智利圣地亚哥1999年8月2日电。

委会对 12 个拉美国家的统计, 人均实际社会开支的地区平均数 1980~ 1981 年为 237 美元, 1982~ 1989 年为 201. 7 美元, 1990~ 1993 年为 208. 2 美元, 同期社会开支占全部公共开支的比重(地区平均数)分别为 43. 5%、34. 2% 和 45%。可见, 社会开支在 80 年代大幅下降后, 进入 90 年代又恢复增长, 但国家间的差别较大。1995 年, 拉美地区人均社会开支达 242 美元。按人均社会开支的高低, 可将拉美国家分为 4 类: 人均超过 500 美元的有阿根廷和乌拉圭; 250~ 499 美元的有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和智利; 100~ 249 美元的有厄瓜多尔、巴西、哥伦比亚和墨西哥; 不到 100 美元的有玻利维亚、巴拉圭、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按 1995 年和 1980 年相比人均社会开支的变动情况, 可将拉美国家分为 3 类: 1995 年人均社会开支比 1980 年增加 50% 以上的有乌拉圭、墨西哥、哥伦比亚和巴拉圭; 增加 10% ~ 30% 的有阿根廷、巴拿马、哥斯达黎加、智利、巴西和洪都拉斯, 1995 年还没有恢复到 1980 年社会开支水平的有厄瓜多尔、萨尔瓦多、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¹⁶

在社会开支的使用上, 拉美国家间也存在明显差别。例如, 有些国家采用所谓“聚焦法”, 即用相对有限的资金重点扶持那些处境最困难的社会群体, 效果比较好。又如, 近些年拉美国家宣布了不少社会扶贫计划。有些国家因政府组织实施计划的能力较强, 并重点支持一些生产开发项目, 以防止大量返贫现象的出现,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如智利在 1990~ 1994 年间就有 135 万人脱贫。而有些国家的扶贫计划却并未产生明显的社会效果。此外, 不少拉美国家还采取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以增加就业等缓解社会贫困的措施。

结束语

拉美国家的社会贫富分化问题并不是新近才出现的。从历史上看, 拉美国家在独立运动后的建国初期, 通过所谓“自由改革”, 进一步强化了殖民地时期的大地产占有制度; 20 世纪 30~ 70 年代期间, 不少拉美国家也进行过程度不同的土地制度改革或其他领域的改革, 但从总体上看成效甚少。因此, 拉美国家的社会贫富分化问题有其历史的和制度性的根源。战后初期, 人们曾普遍把解决社会贫富分化问题寄托于国家的工业化与现代化发展。尽管 1950~ 1980 年期间拉美地区取得了持续 30 年的较高经济增长(年均增长率 5. 6%), 但社会问题却呈现普遍加剧的趋势。70 年代后期, 当时在拉丁美洲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曾不无遗憾地指出: “从社会观点来看发展已偏离方向。”“这里(指拉丁美洲)呈现出的矛盾是非常严重的: 一极是繁荣以至富足, 另一极则是持续的贫困。”“这是经济进程与民主进程之间的矛盾。因为前者趋向于使发展的成果局限在社会的一个有限的范围之内, 而民主化则趋向于将这些成果作社会性的扩散。”¹⁷ 可以说, 时至今日, 拉丁美洲经济进程与民主进程之间的矛盾继续存在, 甚至更加严重。那种把拉美地区近 20 年来社会形势的恶化单纯归咎于 80 年代经济危机的影响的观点, 显然是片面的。20 多年来的经济改革依然没有找到一条使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道路, 这无疑是拉美国家跨入新世纪时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责任编辑 蔡同昌)

¹⁶ 同, 第 52~ 54 页。

¹⁷ 劳尔·普雷维什:《外国资本主义: 危机与改造》, 中文版, 第 9~ 10 页,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SINO-LATIN AMERICAN TRADE RELATIONS AND THEIR DEVELOPMENT PROSPECTS

With the deepening of China's reforms and the wider opening of Latin America's market, Sino-Latin American economic relations have been developing rapidly. In the 1990s bilateral trade grew steadily, with China's long-standing deficit turning into relative balance or even a small surplus. China's major trade partners are Brazil, Argentina, Panama and Chile. Along with bilateral trade, Sino-Latin American cooperation has also been moving forward in other areas like technology, investment and labor contract, among others.

Difficulties still exist in many ways. They include Latin America's frequent practice of "anti-dumping" towards Chinese exports, lack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poor quality of China's products, and the negative effect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Latin America.

However, prospects of Sino-Latin American trade are bright. For China, it is important to expand the range of exports to such products as electronics and machinery. China should also encourage investment in the Latin American market in natural resources (such as forestry) and improve quality of the products and transportation. (Wang Jian)

RECENT SOCIAL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Poverty, along with unemployment, remains a serious issue in Latin America. If not tackled immediately and properly, the issue will impose danger to the stability of the region.

Economic crisis and high inflation rate of the 1980s as well as economic restructuring in the 1990s were the evident reasons that can explain the worsening social situations in Latin America.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re are two major schools of thoughts regarding the social problem. The neoliberal idea believes that poverty will decreas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poverty and income inequality are the inevitable results of economic growth. Neoliberalism, on the other hand, argues that social development should go hand in hand with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play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is regard.

In any case, the social issue in Latin America will remain because no effective policy is expected to be undertaken. (Su Zhenxing)